

范仲淹的浙江缘(一)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提起范仲淹，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他那回荡时空、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在“文坛”，范仲淹以诗词著名，名篇《岳阳楼记》滋养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成长；在“政界”，他是政绩斐然、刚正直言的范文正公。

仅两宋时期，范仲淹不光受到欧阳修、曾巩、王安石等多位重量级名人的推崇，更是被朱熹赞为“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苏轼曾将未能结识范仲淹引为“平生之恨”，回忆自己一生功绩，苏轼曾写下：“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无独有偶，范仲淹在浙江也有无法忘却的三州：睦州、越州、杭州。那么，这位“第一流人物”与浙江有着怎样的缘分？今日起，本报推出作家董利荣的《范仲淹的浙江缘》，今天推出第一期。

三次任职浙江

董利荣

尽管范仲淹（989年~1052年）祖籍地、出生地都与浙江无关，但他曾先后三次任职于浙江大地。范仲淹在浙江三州主政一方的经历，对浙江的贡献不可谓不大，影响也不可谓不深远。

这位史称“范文正公”的北宋名臣，向来广受赞誉，仅两宋时期，就受到多位重量级名人如欧阳修、富弼、曾巩、苏轼、王安石、司马光、王十朋、黄庭坚、朱熹等人的竭力推崇。

比范公年轻48岁的苏轼，从小就闻知“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此四人者，人杰也”，这位大文豪后来有幸结识另三位“人杰”，“而公独不识，以为平生之恨”。南宋理学家朱熹，则称赞范公为“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

那么，“第一流人物”范仲淹，究竟与浙江有着怎样的缘分？

范仲淹第一次结缘浙江，是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彼时，他在朝廷担任右司谏，因谏言“郭后无故不可废”，第二次遭遇贬谪，从朝廷空降至睦州任知州。

睦州（其时别名桐庐郡），辖桐庐、分水、建德、寿昌、淳化、遂安6县，即今桐庐、建德、淳安三地。

出知睦州是范仲淹平生第一次在州级地方政府主政，虽然仅仅半年有余的短暂时日，然而正值45岁年富力强的范仲淹，却在小试牛刀中大显身手，政绩可圈

可点。

比如，针对“二浙之俗，躁而无刚”的特点，他注重以仁义礼训教化人们，很快见效：“吞夺之害，稍稍而息。”

短暂的任职期间，他做了许多实事，如在州府所在地三江口（今建德市梅城镇）兴修水利工程，治理水患；兴建龙山书院，开州府办学之先河。在桐庐县境内修建严子陵祠堂，并撰写记文；二访方干故里，激励方氏后人。

江山清绝的睦州山水还让范仲淹诗兴大发，佳作频频。尤其是《潇洒桐庐郡十绝》，一咏十叹，一气呵成；深入人心，流传至今。前几年热播电视剧《清平乐》中，范仲淹吟诵这组诗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

范仲淹第二次任职浙江是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这一年的十一月，他从润州（今江苏镇江）徙知越州（即绍兴），翌年正月，50岁的范公正式到任。

越国故地绍兴，是范蠡协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建功立业之地。而范仲淹始终视范蠡为先祖，有缘赴浙任职，便让范公多了一份亲近感。

范仲淹一到任，就去拜谒范蠡古迹翠峰院并题诗一首：“翠峰高与白云闲，吾祖曾居水石间。千载家风应未坠，子孙还解爱青山。”

范公还发扬其一贯崇尚先贤的作风，

寻访唐朝贺知章故居天长观，“度材而新之”，“以广游人之观采”。在绍兴，范公又建稽山书院，延聘著名学者李觏（泰伯）前来讲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范公当时在州府发现一口废井，派人清理后，发现井水清白而甘甜，于是给它取名“清白泉”，将泉边凉亭取名为清白堂，又修筑一座清白亭。由于“爱其清白而有德义，可为官师之规”，于是写下《会稽清白堂记》。

清廉为官、广受越州官场与民间好评的范仲淹，在绍兴一年有余，即于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离开，奉命于六月奔赴西北延州（今延安）抗击西夏进犯。范仲淹与韩琦一道创造了宋代的一个军事奇迹，使这样一位人们心目中的文人，成为我国历史上毋庸置疑的杰出军事家。

范仲淹“浊酒一杯家万里”的坦然和“将军白发征夫泪”的豪情，感染着一代代仁人志士。据中国范仲淹研究会会长、北大教授范国强先生考证，范公笔下的“浊酒”，就是绍兴黄酒。范公将黄酒酿造工艺带入边塞，请人酿制黄酒发给官兵饮用，居然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此说来，范公任职越州的经历，还为他在西北御敌助了一臂之力。

范仲淹第三次结缘浙江，已是他的暮年。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已满花甲的范公从河南邓州徙知杭州。邓州正是

他创作“千古第一美文”《岳阳楼记》的地方，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四上四下的坎坷仕途，都浓缩在短短的三百多字中。

远赴“东南巨屏”杭州，让处江湖更远的范仲淹依然“忧其君”。然而，尽管从庆历新政失败后已多年未居庙堂之高，范仲淹却更加“忧其民”。其执政为民的理念与实践，更多了一种开拓进取和无畏无惧的精神。这一点就集中体现在他在杭州实施的“荒政三策”之上。

范仲淹主政杭州的第二年，浙江爆发大饥荒，杭州灾情尤重。范公一改开仓济民的常规办法，而是一来抬高粮价，吸纳各地粮食纷纷运入，反使杭城粮价大跌；二来下令大兴公私土木之役，广招民工，以工代赈；三来更大胆的是纵民竟渡，休闲游湖。

范仲淹亲自带头，每天坐着画舫出游宴请于西湖之上。范公此举引得有钱人纷纷效仿，慷慨解囊，钱物流通，消费顺畅。此举多管齐下，收效明显。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此事给予高度评价：“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

范仲淹的“荒政三策”，无疑在西湖之畔，矗立起一座先忧后乐的丰碑。

兰石斋杂记(二)

叶浅予先生画《红嫂》剧本封面

蓝银坤



浅予先生：

蒙您慨允为《红嫂》一书画封面速写，甚为感谢。

我们觉得这本书的封面，表现具体情节较难，人物太多不易突出主角。因此，我们想干脆封面上就画红嫂（双手捧水瓶、正面稍侧身的形象），您看可否？这仅仅是我们的一个想法，供您参考，您如果有别的构图那更好了。

谢谢您的支持，耑此，致
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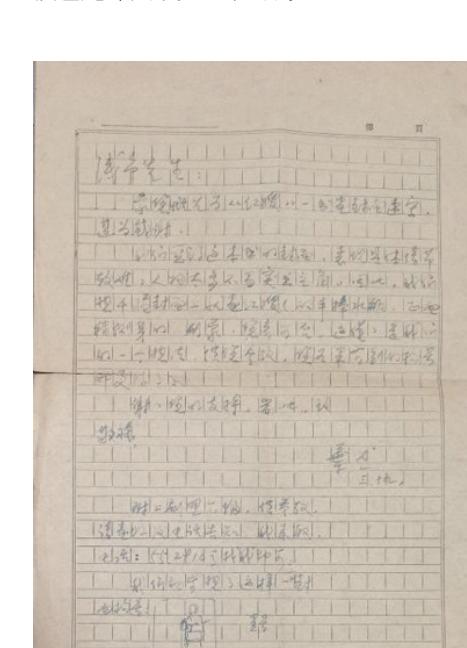
叶然

在孔夫子旧书网看到这封信，毫不犹豫地拍下了，这是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美术编辑室负责人叶然先生写给叶浅予先生关于《红嫂》京剧剧本封面设计的一封信。

叶然，别名刘永吉（1931年~1995年），历任三联书店美术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美术编辑室负责人，《诗刊》社副编审。书籍装帧设计有《鲁迅全集》《高尔基选集》等。《楚辞集注》获莱比锡金奖。出版有《叶然书籍艺术作品集》等。

京剧现代戏《红嫂》，是根据知侠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描写了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革命英雄故事。当时国民党重点进攻我山东解放区沂蒙山区，我军排长彭林，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掉了联系。国民党“还乡团”搜捕我军伤员，红嫂上山挖野菜，无意中遇到因伤重昏迷的彭排长。红嫂将其掩藏在村外，每天送汤送饭，直到与部队派来寻找的同志取得联系并协助部队消灭了“还乡团”。

叶浅予先生曾经回顾说：“五十年代，报刊经常发表我的舞台人物速写，琉璃厂画店挂起了我的舞蹈人物画。有人为我担心，提醒我不要陷得太深，也有人鼓励我陷进去，以满足他们的审美情趣。”六十年代，叶浅予先生的笔墨开始解放，画风在严谨法度中日渐潇洒，不再拘泥于一招一式的准确，而是执着于舞蹈动作达到高峰的瞬间，画作常常存在着动感，背景留给人以无尽的想象余地。叶浅予先生创作信守以形写神的造型原则，认为形神统一是中国画美学传统的精华。他提倡齐白石“似与不似之间”的艺术理念，进行了半个世纪的创作，为读者提供了众多美好的艺术形象。《红嫂》京剧剧本封面速写正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该剧本由山东省淄博市京剧团改编、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六五年正式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封面题字“红嫂”二字应该是叶浅予先生书写的。



叶然致叶浅予先生信函

大奇山路988号

方向明

大奇山路988号。这个门牌号，地图上是找不到的，却是我心中的一个地标。

怎么介绍这个地方，颇费思量。这么说吧，这是作家陆春祥的文学工作室，他自己题名为“富春庄”，坐落于浙江省桐庐县富春山健康城。陆春祥的说法是，富春山往南逶迤数十里就是大奇山，大奇山路与罗家弄交叉口即“富春庄”。

去年初夏时节，我懵懂走近这个地方，至今还记得初见这里的两棵大樟树时的情景。那日循着会议册子指的方向，我从酒店步行到此。会场在一幢新建的二层建筑，南面有两棵大樟树。我在两棵大樟树下驻足。一棵树叶落尽，粗壮的枝丫刺向淡蓝的天空。另一株枝繁叶茂，留下一大片绿荫。会议间隙，几个人站在窗口看窗外的两棵樟树，以及前方高低错落的白墙黑瓦。有的还下楼在大樟树的树荫下走，读一读树旁方形石块上刻写的文字：树龄600年，平均冠幅24米，胸围545厘米，树高19米。挂牌单位：桐庐县人民政府，挂牌时间：2018年。读完石刻文字，见粗大树根上长着一个大大的空洞，像极了一个大耳洞，收纳着天地万物发出的声响，自然也包括这个二层建筑里人们从麦克风吐出的每一个字。

十多年前第一次到桐庐，富春江两岸的景致让人难忘，也颠覆了对于所谓好地方的认知。以前总觉得自己家乡是好地方，满街的高档汽车、酒店的红火生意和“百强县”的名号让自己陶醉了多年。来到桐庐，走在如画的山水间，扑面而来的苍翠和清新空气，富春江的江鲜，某一瞬间，让我坐井观天的自我陶醉塌方了。这次省散文学会的会议放在桐庐开，让我对这次的出行多了一种冲动，桐庐是个好地方，况且这里还有我相识多年的老友。真是心有灵犀，一想到老友，他的电话就过来了。他大名董利荣，和我都是老文联，也喜欢写，他带着新出的书过来看我。他教过书，长期浸润于文学艺术而乐此不疲，还是知名的范仲淹研究专家，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惜才如命的人。这也让我对桐庐又添了一份好感，或许这也是这里的文化逻辑的一部分。我们找了个地方坐下聊，临走时他送我一本新作，用毛笔签了名，墨迹尚新，衬了一小片薄薄的宣纸。

如果不是后来文友提到了“陆春祥书院”，这次的桐庐之行可能仅限于是一次怀旧的旅行，但不会给我带来太多心灵的撞击，也不会让我生出更多感慨来。

下午的会议结束了，我随着人流走出会场，走在大樟树的树荫下，同行的峻毅说了一句，“要不，去看看陆春祥老师的书院？”我知道陆春祥是桐庐人，却不知老陆

兄拟的，字是书院管家写的，哈，管家也得了得。

看过照壁，上三个台阶，未走近，就见一面墙。这可能是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墙。是一面手模墙。手模见过吗？在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进门有一个老人的手模，是巴金先生的手拓印的，那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手模。那里仅有一人的，而这里，是几十人（我一下都数不过来）。这是宁肯的手，右下方有他的签名。宁肯长得精干，这手自然也精干，用现在流行的话，叫骨感是吧。那是写出了《三个三重奏》这般有精巧装置的长篇小说的手，是写出了《说吧，西藏》一类有实验精神新散文的手。旁边的是北京女作家徐坤的，这手丰腴多了，能想到徐坤那圆润的脸和温润的脾气。至今犹记得那年《人民文学》在慈溪搞活动，徐坤点评作品时对于地方作者的苦口婆心。手模应该是铜铸的，风吹雨淋后有铜锈滴落在徐坤的手上，让这只手带上了沧桑感。这是河北李浩教授的手，两条主线十分清晰，拓模时他用的力道恰到好处，正如他剖析年轻作者小说时那样，轻重提按恰如其分。这是大解的手，那个高高大大的诗人、小说家，他的手显得有些不合比例的精致了，与他自己写的大解俩字也有些不协调。这是蒋子龙的手，写出《乔厂长上任记》的大手。这是张抗抗的手，出生于杭州的女作家略显枯瘦却依然有力的手。这是诗人荣荣的手，经常握到却未曾如此端详，带着男性气质的女性的手。又一只女人的手，她有着冷峻的笔触，当散文日益成为文人养病方式的时候，她的散文依然保持着锐利，对是周晓枫。不能一一描述每一只手了，有的肉实，有的单薄，有的粗大，有的纤细，有的纹路清晰，有的浅纹草草，每一只手，都是不同的人生啊。

这面墙上，我还看到了陆春祥自己的手。虽然老陆说，上手模墙的都是“驻院作家”，共五十四人（加上他自己，共五十个手模），其实还是颇具代表性的，而他自己也上了，这是他自信的表现。五十四位作家，他一一致信邀请，不少人都说这个有意思，有时间要来看看。老陆说，设计，取模，制模，安装，富春庄整个建设过程中，这面铜手模墙花去了他最多的时间。

我这么细细看门楼，看照壁，看手模墙，然后来到一幢楼前。初夏时节已现出暑气，那里撑起了大凉伞，伞下一个大而老的樟树墩，十来把椅子围着，一旁还有可以来回荡的秋千木椅。文友们在那里喝着茶闲聊。我已经忘了当时都听了什么，说了什么，只是那种氛围还牢牢占据着我的脑海。闲聊了一阵，不知是我想

看，还是老陆知道我想看，他领着我到几幢楼走走。这些楼都不高，印象中最高就三层，都只能称小楼。他先让我看“陆春祥书院”，一进去，里面墙上陈列的都是他历年出版的书，每一本都用木框装裱起来的。满墙的书，这是一个码字人的劳动果实啊，是心血结晶啊。学问加才情加意志力，造就了这样一面墙。这本《鱼找自行车》封面上的陆春祥还略带青涩。这是我读过的他的第一本书《病了的字母》，就是凭这本散文集他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天地放翁》是为他的同姓诗人写的文学传记，他为陆游做传是相宜的。这几本是他的“笔记新说”系列……站在满墙的书影前，我变得木然了，我肃然起敬，却无法表达。木然了很久，我提出想在书影墙前拍个照，和这些书的主人一起。后来看照片，春祥兄戴着他的招牌帽，穿着T恤衫，左手搭在右手腕上，眼里有一丝温和，微微笑着，一种云淡风轻的笑容。

整个庄子很大，共有五幢楼。老陆领我一幢一幢看过来。A楼是主楼，“陆春祥书院”这五个字是请蒋子龙题的。楼上是他写作的地方，还有一间铺着毛毡和宣纸，墙上是围巾在风中飘逸着的鲁迅木刻像。我还注意到窗边的一把摇椅，可以想见，主人写累了，有时走动走动，有时斜靠在这把摇椅上，望向窗外，应该望得见逶迤的大奇山吧。C楼文学课堂有整面墙的书柜，“顶天立地”的书柜陈列着浙江众多散文作家的签名作品。我还看到了李浩的书法“功不唐捐”和马叙的脱去了火气的水墨画。

老陆送我到门口。我说，你真会选地方。他也不客气，嗯，这个地方确实不错，原来县里打算留着做院士工作站的，被我先下手了。

他这是回老家。桐庐，故土。他当年从这里起步，走了一圈，走到了杭城，走向了全国，现在虽两鬓染霜却笔力尤健，又走回来了，这应该也是这片土地的文化逻辑的一部分。

走过手模墙旁，老陆指着墙上方一行闪光的铜字：“我们将整个世界视为自己的花园。”

又是一句豪语。作家们将整个世界视为自己的花园。我私下也有个豪壮的想法，这个“富春庄”也是属于我的，我的花园的一部分。

“富春庄”里有不少树及花草，包括三株樱桃树，两棵杨梅树。因为我的家乡慈溪盛产杨梅，号称“中国杨梅之乡”，于是对“富春庄”又多了一份好感。正是杨梅花季，杨梅花不时飘落在行道砖上，碎碎的，细细的。